

# 东京梦华：南宋人的开封记忆\*

梁建国

伴随着城市化浪潮的推进,城市更新的速度日益加快,如何记录和保存不断逝去的城市历史,是人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近年来关于城市记忆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城市记忆”

就是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是人们对这些历史记录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提取过程的总称。正如陈平原所说:“当

我们努力用文字、图像、用文化记忆来表现或阐释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时,这座城市的精灵,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sup>1</sup>

靖康之难,开封沦陷,宋室南迁,驻跸临安。因为战乱的原因而被迫离去这座曾经熟悉的繁华都市,南渡移民内心的痛楚显然是刻骨铭心,南宋朝野对开封有着无限的怀恋。那么,他们对于开封有着什么样的城市记忆?他们又是如何来重建这些记忆?这些个体的记忆又是如何凝固为南宋人的集体记忆?相对于客观的开封城,这些主观的记忆有着什么特点?本文拟就这一文化现象做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开封民俗景观的移植

入乡随俗,本来是移民生活方式的基本变化趋势,但这对于南渡的开封人却并不适

用。开封百姓是在帝都沦陷的情况下背井离乡,被迫流落南方,所以他们对于故土的感情非常复杂,其中既有离别之情,更有亡国之恨。开封的记忆深深烙在心底,来到临安

以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复制以前的生活内容,试图将开封的城市记忆在临安中得以再现。对于南渡开封人来说,曾经熟悉的市井风情能在临安重现,这也不失为开封生活的另一种复活。

临安作为赵宋皇室的行在所,成为开封人南迁的重要聚集地。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云:“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开封人移居到临安城内往往重操旧业,“如厢王家绒线铺,自东京流寓,今于御街开张,数铺亦不下万计”。<sup>2</sup>“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sup>3</sup>开封城的特色饮食最能引起时人的怀旧情怀。直到孝宗(1162—1189)年在位时,“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市店遭遇者,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张家团子”。<sup>4</sup>袁褧《枫窗小牋》卷下亦载:“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盘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爇物、石逢巴子南食之类,皆声称于时。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也。”南迁的开封人在临安城内经营着具有开封特色

梁建国,2007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宋史。

的酒楼、茶肆和食店。对于曾在开封生活过的人来说,临安城内的这些“汴京遗风”能够勾起他们对于开封的记忆。

开封人初到临安,对于当地的气候、风俗多不习惯。比如开封的饮食业比较发达,“京师人家日供常膳未识下箸,食味非取于市不属履”,而这些饮食在临安就不容易买到,有些人就开始思念开封,“命仿效制造”,但做出来的效果“终不如意”,再也找不回当年的风味。不仅是饮食,临安城里所售的其他很多物品,也大都仿效东都开封的遗风,虽然“名色自若”,但最终还是不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反而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日趋苟简”,<sup>5</sup>只图容易销售而已。不仅士庶百姓,就连在开封生活过的宋高宗对于汴京的特色食品也是念念不忘。孝宗淳熙年间,太上皇赵构“宣索市食,如李婆婆杂菜羹、贺四酪面、脏三猪胰、胡饼、戈家甜食等数种”。赵构笑谓史浩曰:“此皆京师旧人。”<sup>6</sup>总之,南下“京师人”带来了东京的传统烹饪技术、风味制作以及冷藏食物等方法和技术,且为当地人所采用。当然,这种模仿并不能完全还原开封的面貌。临安城中的饮食既模仿了汴京的烹饪方法,也保持和发展了鱼米之乡特色丰盛的优势,“南料北烹”,经过一百余年的交流与融合,遂“混淆,无南北之分矣”。<sup>7</sup>

此外,临安的饮食店为招揽顾客,也刻意按照开封的习惯来装饰门面和布置店内陈设,营造出东都汴梁的氛围。“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sup>8</sup>“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sup>9</sup>有些高级酒楼的门首更是“以枋木及花样沓结,缚如山棚,上挂半边猪、羊,一带近里门面窗牖,皆朱绿五彩装饰”,一如汴京酒楼的

“欢门”。<sup>10</sup>并沿袭东京风习,拓宽店堂,厅院落庑,花木森茂,酒座雅洁,分阁坐次,重帘遮隔,自成天地,不使食客群集一处,以避免人来客往,嘈杂不适。“杭城食店,多是效学京师人,开张亦效御厨体式,贵官家品件。”<sup>11</sup>“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sup>12</sup>开封的早市场景也在临安城中再现。每日交四更,“御街铺店,闻钟而起,卖早市点心”。各行铺食及流动食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sup>13</sup>对于未曾到过开封的南宋人来说,正是经由临安城中处处点缀的那些“汴京气象”形成了对于开封的城市印象。

时人习惯于将开封和临安对举,关于临安的文献在描绘临安的市井风俗时,对于开封每每提及。比如《武林旧事》在细致描绘临安的市民风俗之时,以“东都遗风”来作结,也间接表达了他们对于开封的城市印象。史籍的撰述者在描绘临安城时,对于其中汴京文明的积极捕捉,也暗示着帝都形象由开封向临安的成功转移。也就是说,临安越来越肩负起都城的功能,而这自然是其积极模仿开封的结果。

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展露出时人的多种心态。首先是开封人对于汴都的怀旧心理,他们对于故土的思念最直接地体现就是对开封饮食习惯的念念不忘。其次是临安人对于开封的积极追随心理,这既是迎合开封人的思乡情结,也是为了提升临安的城市层次而刻意营造的氛围,使其能尽快达到帝都的高度,并承担起都城的功能。临安城中这些带有开封印记的事物也让他们感受到越来越浓郁的帝都气息。其三是临安商人的逐利心理与开封人的无奈心理。时人对“山寨版”的开封文化显然是不满意的,但也只能接受

这种现实。这些打着开封名号的物品,至少能勾起时人的怀旧情结,虽然在消费之后难免有几多失落和惆怅。随着时间的推移,半个多世纪之后,南渡的第一代移民逐渐谢世,他们的子孙辈对于开封的城市印象也就在与临安的交叠中逐渐模糊。

如果说以上所论是民间社会在临安城中营造开封当年的市井氛围,朝廷和官方则是通过临安的城市建设来再现开封的帝都气象。

开封沦陷之后,南宋朝廷迫切需要在南方寻找一座城市来承担帝国都城的功能。几经周折,选定杭州,改名临安,并参照开封来着手建设。<sup>14</sup>《玉海》卷一六《绍兴临安定都》所载:

绍兴四年,将还临安,始命有司建太庙。十二年,作太社、太稷、皇后庙、都亭驿、太学。十三年,筑圜丘、景灵宫、高拱坛、秘书省。十五年,作内中神御殿。十六年,广太庙,建武学。十七年,作玉津园、太一宫、万寿观。十八年,筑九宫、贵神坛。十九年,建太庙、斋殿。二十年,作玉牒所。二十二年,作左藏库、南省仓。二十五年,建执政府。二十六年,筑两相第、太医局。二十七年,建尚书六府。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庙宫省始备。

经过多年经营,至绍兴二十八年,临安作为都城所必备的功能建筑终于初具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南宋朝廷对于临安城的建设俨然是对于开封城的复制,正可谓“一时制画规模,悉与东京相埒”。<sup>15</sup>当时城中的许多建筑都是仿效东京而建,比如南宋临安的皇宫,不仅规模和东京的皇宫相仿,而且连宫殿的格局也和汴京相同。再如临安大内丽正门前的宫廷广场也是仿照开封而建,并在广场的四周设有红漆杈子,限制行人通过。与东京宫殿一样,临安也是一殿多用、一殿

多名。贯穿临安南北的“天街”,同样是仿效东京御街,在街中划设御道、河道、走廊等不同功能的分道。南宋人在临安体验到帝都气派的同时,也很容易联想到汴京曾经的辉煌。

宗教祭祀是皇室在开封时的重要活动内容,原在开封的一些宫观也先后在临安复建。“宋南渡时,凡汴京有庙者,皆得祀于杭”。<sup>16</sup>这些侨置宫观大多与帝国政治结合紧密,是帝国统治连续性与合法性证实的舞台,并且是帝国与皇室安危的心理保障。因其在南宋帝王政治中的特别意义,而受到皇室的特别眷顾。<sup>17</sup>

作为休闲游乐的场所,园林也是南渡宋人怀旧情愫中不可或缺的载体。在临安的园林营建中,不仅东京的建筑技术和方法被大量采用,而且连名称、布局等也被沿用。比如建于绍兴十七年(1147)的御园玉津园,就是沿用“东都旧名”,并在园林布局上也仿效东京南薰门外的玉津园。北宋开封园林流行种植的牡丹,同样风靡临安,如聚景园中的牡丹,就称盛于时。<sup>18</sup>这样,南渡宋人虽在临安却恍然回到开封故园,产生“只把杭州作汴州”的幻觉。未曾有过开封经历的南宋人也能通过临安城中的“汴都遗风”去想象、体验北宋开封的城市意象。

当然,关于开封的城市记忆在现实中并不可能完全复制,而是结合临安的山水水系因地制宜地加以改造。因此,这座崭新的临安城既融入了汴都文明的诸多元素,又保留了西湖山水的明丽风情。

## 南宋人的口述与笔传

(一) 南渡开封人对于当年的生活难以忘怀,在日常生活中每每对人言及,希望能够将开封的美好记忆传之后人。比如周燁的祖母,“暇日与子孙谈京都旧事”。<sup>19</sup>特别是

在绍兴初年，“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十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五六十年后，更无人说着，盖耆旧日就沦谢，言之可胜于邑。”<sup>20</sup>但是，随着这代人的谢世，人们对于开封的感情也就逐渐变淡，少有提及了。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这又是他们所焦虑的。

南渡文人在著述中也会点点滴滴地追忆开封旧事。比如叶梦得(1077—1148)在北宋时历宦哲宗、徽宗、钦宗数朝，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调丹徒尉。宋徽宗时入京，后与当权丞相蔡京交往密切，用蔡京荐，召对，特迁祠部郎官，累迁翰林学士。由于久在京城为官，见多识广，故而谙熟朝廷典章制度和掌故轶事。他在晚年隐居湖州弁山玲珑山石林。绍兴五年因酷暑难熬，不能安其室，于是每日早起，即择泉石深旷、竹松幽茂处避暑，与其二子及门生“泛话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道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皆后生所未知”。<sup>21</sup>后由其子栋据以择记之，因名《避暑录话》。他的另一部笔记《石林燕语》也是成书于南渡之初，书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北宋开封。

再如蔡絛，其父蔡京在宣和六年第四次被起用为宰相，因其年老体衰而不能视事，一切政务悉决于蔡絛，且代京入奏。次年，金兵南犯，开封沦陷，蔡絛被流放到白州(今广西博白)。在此期间，蔡絛撰写了《铁围山丛谈》。此书为笔记体裁的杂著，上起宋乾德年间(963—968)，下及南宋绍兴(1131—1162)，这之间二百年的轶事，无不详志备载。所记内容，都是他在京师亲见或亲闻之事，其中有许多记载，比其他笔记、野史乃至正史的有关记载都更为详尽。

还有一些文人虽未有过在北宋开封生活的经历，但在日常生活中会听到父祖辈谈及当年在开封的见闻。他们当中有喜欢著述者，遂将听到的内容诉诸文字。比如《清波别

志》的作者周煊(1126—1198)，“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岁晚遗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笔之。”这就是传世文献中的笔记小说，构成关于开封记忆的另一个系统，是后人了解北宋开封的另一重要的史料来源。

陆游(1125—1210)也未曾有过开封的生活经历。不过，他“尤熟识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处，以故声名振耀当世”。<sup>22</sup>他家中富有藏书，自幼得以博览群书；又随他父亲会见过许多前辈的学者和士大夫，得以聆听他们的谈吐；成年后，到临安、四川、江西、福建等处做过官，阅历见闻极富。他的《老学庵笔记》大约创作于宋孝宗淳熙末年到宋光宗绍熙初年间，其中有不少内容即有关开封的城市生活及朝廷的人事掌故。

开封的沦陷，象征着北宋王朝的覆灭，南宋文人的亡国之痛也反映到以汴京为主题的文学创作中。刘子翬之父刘鞬在靖康之难时奉命出使金营，拒绝金人诱降，自缢而死。刘子翬时年30岁，听到噩耗后，悲愤交集。他慨念故国，既痛国家变乱之端，亦识君臣误国之由。<sup>23</sup>不久写下了《汴京纪事》20首，前7首纪国都沦陷，后13首忆往日繁华，以对比的方式将他那种交织萦心的“靖康血难，国仇家恨”表现得淋漓尽致。刘子翬受其父爱国思想影响很深，南渡后虽隐居乡里，但无时不忧国，唯因病魔缠身，无力请缨，壮志难酬，因而写入诗中，多以长篇或组诗全景式地反映社会时事，如《望京谣》、《谕俗十二首》等。

笔记小说、诗歌等记载比较零散，涉及人物、风俗、掌故、传闻等，范围比较广。有些虽然不是直接关于开封城，但由于其人物、事件发生于此，可以极大地丰富后人对开封城市生活、城市社会、城市文化等领域的认知。



(二)自北宋以来,专门记载开封史事的书籍并不多。北宋时期,宋敏求写过一部《东京记》二卷,载宫阙里巷事迹,可惜未能留传下来。王权的《夷门记》、环中的《汴都名实志》等有关开封的志书已难寻找。南宋绍兴十七年,孟元老撰成《东京梦华录》,对开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描述。

孟元老在徽宗崇宁二年(1103)来到东京,居于“金梁桥西夹道之南”<sup>24</sup>,渡过了二十四年太平和美的生活。可是,靖康二年(1127)金人入侵,北宋灭亡,孟元老只好逃离开封,举家南下,避地江左,终老此生。在南方居住时,他缅想当年在开封“节物风流,人情和美”的生活,难免愁绪满怀。孟元老在《梦华录》序中谈及著书缘起时,亦云:

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漫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sup>25</sup>

对于北宋开封曾经有过的繁华,在南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没有亲身体验过,他们只是从父祖辈的言谈中获知一些零碎甚至失实的信息,而对此又不以为然,缺乏深厚的感情。孟元老敏感地意识到,一旦他们这代人谢世之后,后人再谈起北宋开封的情况,就更难以说清了。因此他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决心在有生之年将开封的情形写出来以传之后世,以缅怀昔日的市井繁华,使人“开卷得睹当时之盛”。

《梦华录》所描述的内容相当丰富,远远超出之前所有关于开封的文献,为我们描绘了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

该书第一卷是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这既勾勒了开封城的外部轮廓和地理框架,也

体现出开封作为京城的政治功能。

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集中介绍开封城内的主要街巷,而这些街巷无不是充满着浓郁的商业气息,即使相国寺这样的佛家圣地也不例外。沿街的店铺,特别是饮食店铺又是介绍的重点内容。

第五卷是介绍开封的民俗,包括京瓦伎艺、娶妇、育子等。第六至十卷则逐一介绍一年中的各种时令节日,描述了上自皇家下至庶民在节日期间的各种庆祝活动,而对于朝廷朝会、郊祭大典多有渲染,鲜明地体现出皇城的帝都气象。

从《梦华录》所记述的内容来看,孟元老心中最为深刻的开封记忆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以街巷为中心的开放式的城市格局。这反映出北宋开封城市发展的新变化,打破了之前城市的坊里结构。第二,发达的商业所浸润的浓郁的世俗气息。第三,繁荣的娱乐业所熏染的无边的享乐氛围。第四,皇家的威仪所烘托的煊赫的帝都气息。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作为开封城市记忆的载体,《东京梦华录》中的图景也不可能是北宋开封的全貌。相对于开封城市本身的多元性、复杂性而言,《梦华录》所展示的也只是一个横截面。就时段而言,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1125)年间的情况;就内容而言,也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梦华录》着眼于城市生活的积极面,而粉饰、屏蔽了其消极面。<sup>26</sup>北宋开封虽然繁华,也有社会下层贫困人群,乃至流氓恶棍之类的存在。而对于城中的恶棍,《梦华录》是这样描绘的:“妓女旧日多乘驴,宣、政间惟乘马,披凉衫,将盖头背系冠子上。少年狎客往往随后,亦跨马轻衫小帽。有三五文身恶少年控马,谓之‘花腿马’。用短缰促马头刺地而行,谓之‘鞅缰’。呵喝驰骤,竞逞骏逸。”《梦华录》传递了这样一种骑马护送妓女的“恶少年”形象,包括他们温和又使人怜

爱的模样,是片面的。其他文献资料则清楚地展现出“恶少年”气势汹汹和蛮横放肆的形象,难得一见他们在《梦华录》里殷勤的样子。与“恶少年”类似的还有乞丐。《梦华录》描述的时期内,尽管徽宗做了种种努力,显然也无法周全地照顾汴梁的穷人,仍然有许多人流落街头。但是,在整本《梦华录》里,乞丐只有一处被提及:“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sup>27</sup>在汴梁街衢上的人们似乎不大可能像《梦华录》里描写的那样,井然有序而且毕恭毕敬。

南渡文人经历了《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繁盛景象,却又突遭靖康之难,美好岁月戛然而止。目睹开封城的沦陷,心灵上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从南渡文人的心理来讲,回忆既是对过往生活的怀恋,也是对残缺记忆的修复。回忆的过程中必然经过了筛选,那些容易触动负面情绪的事物已被过滤。比如艮岳,这一北宋晚期开封城中最为显赫的园林,在《东京梦华录》遍录东京之名胜佳景,而于艮岳却一字不提。联系艮岳建造的历史,这一疑窦也就不难理解。当年宋徽宗穷奢极欲,为造艮岳,从江南征发花石纲,劳民伤财,直接导致方腊起义。内忧刚刚平息,外患接踵而来,北宋灭亡,生灵涂炭,繁华之东京遂成华胥一梦。虽然不能肯定孟元老就是艮岳的督造官孟揆,但被视为亡国祸根的艮岳确实是宋人心中的伤疤,是汴都繁华图景中很不协调的污点。因此,孟元老自然不愿意触及。

其次,讨论文本的内容,不能脱离作者的个人身份、阶级立场及其思想意识。就孟元老而言,在《梦华录》序中说,自幼随父亲宦游南北。宋徽宗崇宁癸未,来到京师。成年后,孟元老是否做过官,他在序中语焉不详,后人颇多猜测。但从本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十分熟悉东京的宫廷生活。尽管作者在书末的按语中说:“凡大礼与禁中节次,但尝见习

按,又不知果为如何。”一般以为这只是通常的谦约之词,也可能是作者借以隐蔽身份之言。我们抛开孟元老的具体身份,至少可以判定他出身于官宦之家,生活在京城的上流社会。因此,他在开封的生活体验脱离不开他所在的圈子,进入他的写作视野。

孟元老在《梦华录》中对于城市风貌的选择性描述也是基于他自己的生活内容。比如,北宋汴京商业、手工业中,有各种不同的行业,见于《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三、卷四的就有:姜行、纱行、牛行、马行、果子行、鱼行、米行、肉行、南猪行、北猪行、大货行、小货行、布行、邸店、堆垛场、酒楼、食店、茶坊、酒店、客店、瓠羹店、馒头店、面店、煎饼店、瓦子、妓院、杂物铺、药铺、金银铺、彩帛铺、染店、珠子铺、香药铺、靴店等三十多“行”。但实际上开封城内远远不止这三十多种行业。仔细分辨,不难发现孟元老所提到的这些多是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他所熟悉的饮食、服装及娱乐行业。

就店铺而言,《梦华录》共提到的一百多家,其中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就占有一半以上。城中“有‘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潘楼’、‘欣乐楼’(即‘任店’)、‘遇仙正店’、‘中山正店’、‘高阳正店’、‘清风楼’、‘长庆楼’、‘八仙楼’、‘班楼’、‘张八家园宅正店’、‘王家正店’、‘李七家正店’、‘仁和正店’、‘会仙楼正店’等大型高级酒楼‘七十二户’。其中如著名的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不完全的统计,就有:乳炊羊、羊闹厅、羊角、腰子、鹅鸭排蒸荔枝腰子、還元腰子、烧臄子、莲花鸭、签酒炙肚脰、入炉羊头、签鸡、签盘兔、炒兔、葱泼兔、假野狐、金丝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鹌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之类不下五六十种之多。孟元老之所以能够对饮食方面的店铺有如此详细的

描述,说明他平日里经常在外就餐,故而对开封城内的餐饮业情况非常了解。这自然离不开汴京市民饮食消费商品化的大背景。关于这一点,正如周焯《清波别志》中所云:“京师人家日供常膳未识下筯,食味非取于市不属膺”。<sup>28</sup>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初到临安的开封人对于当地饮食尚不习惯,故而对当年开封的生活愈加怀念。

那么《东京梦华录》这一孟元老的个人作品能否视为南宋人的集体记忆呢?

自从《梦华录》刊行以来,就一直被视为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内容。后人在谈及北宋晚期东京掌故时,莫不首引此书,如赵甦之的《中兴遗史》、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以及陶宗仪的《说郛》,对本书的部分资料,都有所选录。因此,这部书虽然是孟元老的个人创作,但在写成之后即广为流传,成为了解北宋开封的最重要的读物,这说明他的个人感受获得了普遍共鸣和广泛认可。这种个体记忆也由此逐渐凝固为集体记忆。

(三)开封沦陷后,宋人虽然日夜期盼着“王师北定中原”,收复京师。但现实中的开封依然是遥不可及,只有参与军事或外交活动的人才可能有机会亲临开封。

郑刚中在绍兴九年随楼照宣谕京陕,曾路过开封。他在《西征道里记》中对于所见的混乱景象有如下描写:

京师旧城外不复有屋。自保康门外西至太学,道无数家。太学止廊庑,败屋中存敦化堂。堂榜犹在,兵卒杂处其上,而牧彘于堂下。国子监令以养太学生,具牕壁略如学校。都亭驿东偏厅事栋牌尚是伪齐年号,糊牕用举人试卷,见当是试题及举人文字,专用本朝庙讳。琼林苑北,人尝以为营,至今围以小小城。金明池断栋颓壁,望之萧然。<sup>29</sup>

战乱过后的开封城中一片狼藉,触目惊心。街巷人烟稀疏,民居所剩无几。太学里没有了学生,而成了兵卒杂处和养猪的所在。伪齐的年号还高挂着,写着宋朝庙讳的试卷被用来糊窗户。琼林苑成为兵营,金明池断垣残壁。抬眼望去,满目苍凉,想起靖康之前繁华似锦的开封城,亡国之痛难以言表。

后来可以目睹汴京旧迹者,就是出使金国的使臣。<sup>30</sup>楼钥在乾道年间曾以随员身份随舅父汪大猷使金,所撰《北行日记》对于开封及中原的情况均有反映。此时的开封已被金国改称“南京”。海陵王在重修开封城时保留了旧城原状,只是稍扩地基,重点修筑了宫阙和城楼,<sup>31</sup>而其他大部分街巷和建筑并未修整。所以楼钥看到的多是颓败景象,比如:“城外人物极稀疏”,“城里亦凋残”,“景德、开宝寺二塔,并七宝阁寺上清储祥宫,颓毁已甚”,“又有栾将军庙颓垣满目”,<sup>32</sup>等等。这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的繁华气派有着巨大的落差。

范成大在乾道六年出使金国时路过开封,所见与楼钥类似。宜春苑是一片“颓垣荒草”,入新宋门,“弥望悉荒墟”,“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范成大最后总结:

旧京自城破后,创痍不复。炀王亮徙居燕山,始以为南都。独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东京虏改为南京,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玑璫冒之,谓之方髻。<sup>33</sup>

可以想见,南宋使臣亲眼所见的残破之象与他们在《东京梦华录》中所读到的繁华

印象简直是判若云泥。然而,比城市建筑的损毁更令范成大揪心的是,开封居民的生活习俗已被金人同化。由此也可以理解孟元老之所以那么细致地叙述北宋开封风俗的良苦用心了。

周輝在淳熙年间随使节前往金国,也曾途经汴都。他在《清波别志》中写到:

大相国寺旧有六十余院,或止有屋数间,檐庑相接,各具庖爨,每虞火灾,乃分东西,各为两禅,两律,自经沦覆,未知今存几院。輝出疆日,往返经寺门,遥望浮屠峻峙,有指示曰:“此旧景德院也。”匆匆揽辔经过,所可见者,栋宇宏丽耳。固不暇指顾问处所。<sup>34</sup>

周輝在出使之前显然对开封的城市建筑有所了解,但故土尚未收复,作为旅人的他行色匆匆,未能来得及一一指认。在亲临汴京旧京之时,国土沦丧之痛更加勾起内心的怅然,字里行间不禁流露出黍离之叹。但他相信,“以中原复中原,规恢洪业,信自有时节”,<sup>35</sup>并渴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对于渴望收复中原的南宋子民来说,这也是激励时人与后人抗金斗志的方式之一。

## 开封文献的搜集汇编

如果说陆游这样出生于两宋之交的一代人,还有机会直接聆听南渡移民对开封的口述,那么南宋建立百年以后出生的人,对于北宋开封的印象就只能是来自于前人文献的记载了。比如王应麟(1223—1296),他出生时距离靖康之难已近百年。对于以王应麟为代表的南宋人来说,北宋文献中关于开封的记述是他们感知开封的其中一个来源。他的《困学纪闻》一书中关于开封坊里的记载就是转引自前人的文献: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晁子止昭德《读书志》考之《东京记》,朱雀门外天街东第六春明坊,宋宣献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门前天街东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后辟小园,号养素园,多阅佛书,起密严堂。<sup>36</sup>

王应麟的另一部巨著《玉海》是一部类书,分天文、律宪、地理、帝学、圣制、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sup>37</sup>由于开封是北宋都城,这些门类中有不少内容就和开封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从而间接保存了大量有关开封史地的资料。

比如,在《玉海》中可以看到北宋文人以开封为题所进行的一系列辞赋创作:淳化三年(992),杨亿《东西京赋》;和嶠献《观灯赋》。咸平四年(1001)二月五日,钱惟演献《东京赋》;吴淑作《论都赋》。天禧年间(1017—1021),杨侃作《皇畿赋》。元丰六年(1084),周邦彦作《汴都赋》。<sup>38</sup>元丰年间,关景晖奏《汴都赋》。<sup>39</sup>宣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1122),李长民上《广汴都赋》。<sup>40</sup>虽然这些作品多是文人为取媚当道、宣扬政见的颂德之作,为文造情,艺术水平不高,但也在不同层面反映了汴都的风貌。比如《皇畿赋》全文4860字,通过对开封四郊风土文物、人文景观的描写,表现了宋都开封的富裕繁华。赋作开篇作者先写京畿的军事防御,随后作者以方位为序分写四郊。东郊着意描画宜春苑、太乙宫和籍田礼,南郊着重描写南郊坛和玉津园,西郊着重写金明池和琼林苑,北郊重点写瑞圣园。关于北宋前期东京的富庶,则以汴河、蔡河的漕运状况加以概述。<sup>41</sup>再如李长民写的《广汴赋》,近七千字,全面描述了汴都宫衙、宫庙建筑的分布图景,突出汴都在政治、仪式上的城市职能。<sup>42</sup>



不单是笔记小说、类书,涉及开封的文献史料既繁多又庞杂。因为北宋的大部分朝廷政治事件都发生于开封,传统政治史所涉及的政治人物、活动空间与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明朝时期,有学者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北宋开封有关的文献。从李濂的《汴京遗迹志》到周城的《宋东京考》,再到宋继郊的《东京志略》,对于开封资料的搜集汇编代不乏人,所搜集的文献范围越来越宽,不断构筑着开封文化记忆的系列链条,丰富了开封的城市内容。这对于后人全面了解开封的历史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东京志略》也不是这项工作的终点,关于北宋开封的史料仍有不少遗落在各类文献中,诸如宋人的文集、诗集、墓志石刻等考古资料。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广义上的城市史,涉及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更多的文献资料可以纳入到开封的研究范围中来。<sup>43</sup>

但是,由于其阅读面相对狭窄,后人搜集和汇编的开封文献,并不易构成普通民众对于开封的城市记忆。以《东京梦华录》为代表的南宋人的记述仍然是北宋开封文献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 余 论

南宋朝野是通过各种方式来追忆、再现他们对于开封的城市记忆。这其中既有对风俗习惯的移植,也包括建筑等实体的重建,既离不开南渡移民的口述言传,更有赖于文字的记述和文献的整理。对于未曾在开封生活过的南宋人来说,他们对于北宋开封的城市记忆是经由多种渠道得以感知。临安城中仿建的开封景观、流行的“汴都遗风”,以及有关开封的各种文献史籍都是他们对于开封的城市印象的重要来源。

南宋人还以不同的方式持续建构着开

封记忆的文献系统。他们或者如孟元老那样,以满腔的热忱、深重的感情将爱国之情诉诸笔端,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饱含深情地将旧都往事向身边的人口述言传,其中一些喜欢著述的听众再将耳闻的轶事记入史籍。也是从南宋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搜集汇编有关开封的文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南宋人以不同的方式来编织有关开封的记忆链条,实际上也是对开封记忆的重新解构和再造。因而可以说,开封作为宋代都城的城市形象正是在宋室南迁之后,经由一代一文人的追忆、口述、笔录、整理而塑造完成。

“所有对于往事的记忆,必定都是残缺不全,有因时间侵蚀而断裂,也有因人为破坏而损耗。面对往日生活的破碎印象,必须有足够的想象力与理解力,方才能很好地复原那些远去了的历史场景,并对其作出准确的价值评判。”<sup>44</sup>南宋人历经靖康之难、国破家亡的洗礼,对于开封有着复杂的情愫,在缅怀逝去的岁月之时,每每注入深重的家国情怀。显而易见,这些夹杂着记述者当事人个人体验的开封记忆,距离北宋开封的客观状貌必然有一定距离,但正因此更能体现出人与城市在时空变迁中的互动。

如果将南宋人和北宋人关于开封的记述加以对比,会感受到其中的明显差异。北宋人在诗文、书信中对开封的记述多是身在其中地即时感受,是浑然不觉地无意识地自然流露,故而呈现出不系统、零散性的特点。南渡宋人的个人回忆则融入了国难家仇的复杂感情,是有意识地以文字重建旧京的记忆,努力复原开封的面貌,因而追求系统,较有条理。当然,这种复原也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的选择性。在叙述内容上,北宋文人多是个人在开封城的生活感受,而南渡文人则侧重于描摹开封这座城市的地理风俗。北宋文人在诗文中也有涉及开封的城市问题,但

更多的是宣泄对城市病的不满,<sup>45</sup>而南宋人在时空上则是从一个较远的距离来审视这座已经失去的城市,更多的是怀念这座城市曾经的美好,因而大都是正面的记述。

相对于城市这一客体而言,城市史是时人与后人以文字等方式对于城市发展历程的记述,是经由个体感受、再次创造的文化产物,因而带有鲜明的主观性。文献作为记述的载体,是连接城市与城市史之间的纽

带,北宋开封的城市记忆就是由一系列的文献层累叠加地构筑起来。

当然,除了史籍之外,《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绘画作品也是我们今天感受北宋开封的重要载体。不过,在张择端完成画作之后800多年的岁月里,这幅旷世杰作一直是历代帝王权贵争夺的目标。而对于南宋时的普通民众来说,反而少有机会看到,因此并不能构成时人开封记忆的重要元素。

## 注 释

\* 本文为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的阶段性生活成果,项目编号11JJD770004。

1. 陈平原:《想像北京城的前世与今生》,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附录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7页。
2. 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西湖文献集成》第2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年。
3. 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食店》。
4. 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
5. 周煊:《清波别志》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周密:《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西湖文献集成》第2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年。
7.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面食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8.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茶肆》。
9.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酒肆》。
10.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面食店》。
11.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分茶酒店》。
12.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八《民俗》。
13.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天晓诸入市》。
14. 关于开封与临安两座城市的关系,学术界有关不少探讨,可参见程民生:《汴京文明对南宋杭州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孙逊、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吴松弟:《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徐吉军:《论中原文化对南宋都城临安的重大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这些研

- 究大都是强调汴京文明或中原文化对南宋临安的影响,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一话题所引用的资料时,会明显地感受到南宋人是在以各种方式复制或再造记忆中的汴京文明。在日本学界,梅原郁以《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史料的整理为线索,展开对东京和临安两个都市的多元研究。伊原弘在《新たな中国都市研究の視点をめぐって:新史料調査の過程において》(《比较都市史研究》1998年17卷2号)也对城市史料的调查和运用提出了不少创见,强调地方史料和图画对城市复原和研究的重要性。
15. 厉鹗等撰:《南宋杂事诗》题辞(张奕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16. 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卷一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7. 段玉明:《南宋杭州的开封宫观——宗教文化转移之实例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3期。
  18. 周密:《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
  19. 周煊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四《汴都旧事》,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20. 周煊:《清波别志》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叶梦得:《避暑录话·自序》,《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十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22. 张淏:《会稽续志》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刘德岑、刘子翥:《〈汴京纪事〉选注》,《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24.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5. 孟元老撰 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序》。
26. 艾朗诺 (Ronald Egan):《宋代文献中的都城面面观》,《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27. 孟元老撰 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五。
28. 周煊:《清波别志》卷二。
29. 郑刚中:《西征道里记》,《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七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
30. 胡传志:《论南宋使金文人的创作》,《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
31. 单远慕:《金代的开封》,《史学月刊》1981年第6期;王曾瑜:《金代的开封城》,《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
32. 楼钥撰:《攻媿集》卷一一一《北行日录上》,四部丛刊初编本。
33. 范成大撰:《揽轡录》,《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34. 周煊:《清波别志》卷二。
35. 周煊撰 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三《朔北气候》。
36. 《困学纪闻》卷二〇《杂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7.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38. 《玉海》卷一六《宋朝四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39. 《鸡肋集》卷三四《汴都赋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 《玉海》卷一六《宋朝四京》。
41. 程秋莹:《杨侃〈皇畿赋〉中对宋都京郊的描写》,《殷都学刊》2006年第4期。
42. 刘培:《论北宋后期辞赋的特征》,《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
43. 近年来,对于北京、上海、长安等城市的研究已经根深叶茂,形成了诸如“北京学”、“上海学”、“长安学”等研究热点。作为七朝古都的开封,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开封的存世文献及考古遗迹也足以支撑起一个“开封学”这样一个为研究视域。
44. 陈平原:《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序一,第2页。
45. 徐力恒:《Coping With Bad Weather in Kaifeng: an Living Conditions as Seen from Ouyang Xiu's Last Decade in the City》,北京大学“中古时期的日常秩序”国际青年学术研讨会,2010年。

率后辈,在培养人才、发展教育、普及文化中做出了大贡献。南宋的乡先生与书院,对后世书院教育的发展、朱陆学术思想的传承等,都有积极影响。

#### 论南宋戏文的思想性、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徐宏图

中国戏曲史的研究,自王国维开始即偏重于元杂剧与明清传奇,而忽略了南宋戏文。后来钱南扬扭转了这一偏向,第一次提出“宋元戏文”的概念,才开始对南戏作全面的研究。但接着又产生了偏重于元而忽略宋的新倾向。有感于此,笔者在拙著《南宋戏曲史》的基础上,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从揭露封建礼教下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抨击科举制度下富易交贵易妻现象、暴露宋金对抗时期的忠奸斗争、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百态四个方面论述它的思想性;从高度的综合性与表演一个完整长篇的故事两方面论述它的艺术成就,同时肯定了它对元明杂剧、明清传奇,直至现当代戏的深远影响。

#### 日本藏无准师范传记新资料及其价值 定源(王招国)

有关无准师范生平的原始资料,至今为大家普遍熟知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南宋禅僧道璨(?—1271)所撰的《径山无准禅师行状》;另一种是南宋文人刘克庄(1187—1269)所撰的《径山佛鉴禅师墓志铭》。本文关注由侍者德如所撰的《佛鉴无准禅师行状》。该行状原藏日本京都东福寺,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在调查原件现况、形态的基础上,围绕本行状的形成背景、作者等问题进行一些基础性的

探讨,并依其内容,举例说明本行状对无准生平研究的史料价值。

#### 《王魁负桂英》故事在宋代的变迁及其政治道德意涵

杨果 方圆

《王魁负桂英》的故事在宋人笔下多有记载,但前后有所变迁,从张师正《括异志》到刘斧《摭遗》,王魁由一个精神染疾之人变成一个负心汉,最终因桂英的鬼魂报复而发疯致死。其他宋人笔记与宋人南戏基本遵循着后者的故事脉络,对负心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宋人的态度反映了市民阶级的果报观念和对卑微女性的同情,但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故事中的王魁和桂英均有特定的意向,并非简单的情爱或情变,而是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对士风的重视、对“忠贞”的倡导,其根源在于宋代士大夫对五代乱世的历史反思以及对宋王朝“外患”严重的现实担忧,士大夫们正是借用王魁悔婚、停妻再娶的“负心汉”形象来指斥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背信弃义、士风沦丧,并以“女鬼复仇”、“天雷轰顶”等惩戒来实施规劝,进行“忠贞”观念的教化。

#### 东京梦华:南宋人的开封记忆 梁建国

对于北宋开封的城市记忆,南宋人是经由多种渠道得以感知。临安城中流行的“汴都遗风”、仿建的开封景观,都是他们开封记忆的重要来源。此外,南宋人还以不同的方式持续建构着开封记忆的文献系统。他们或者如孟元老那样直接将开封记忆诉诸笔端,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将旧都往事向身边的



人口述言传,其中一些喜欢著述的听众再将耳闻的轶事记入史籍。也是从南宋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搜集汇编有关开封的文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些未曾体验过北宋时期开封生活的后人,通过这些史籍得以了解这座城市,感受其曾经的辉煌。因可以说,开封作为宋代都城的城市形象正是在宋室南迁之后,经由一代一代文人的追忆、口述、笔录、整理而塑造完成。

#### 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初考

辛更儒

上海图书馆收藏一部完整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本文通过对此书的部分卷帙与中华书局排印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相比勘,得出此本较上述二本更接近《永乐大典》原收录本的观点。这对于破除《四库全书》本的迷信,以及恢复此书原貌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 《曲洧旧闻》、《南窗纪谈》真伪辨

李裕民

朱弁《曲洧旧闻》与徐度《南窗纪谈》是南宋初年两部著名的笔记,其中有12条内容相同,余嘉锡论定是《南窗纪谈》抄袭《曲洧旧闻》,今本《南窗纪谈》是伪作。本文经考证,提出相反的看法,确认是《曲洧旧闻》抄袭《南窗纪谈》,今十卷本《曲洧旧闻》内杂有许多伪作。

### **A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 in Japan on the Biography of Wuzhun Shifan and Its Significance**

Ding Yuan(Wang Zhaoguo)

With regard to original data on the biography of Wuzhun Shifan (1177-1249), there are mainly two records known to us, namely *The Biography of Zen Master Jingshan Wuzhun* by Daocan (1214-1271); and *The Epitaph of Zen Master Jingshan Fojian* by Kezhuang Liu (1187-1269).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 in Japan entitled *The Biography of Zen Master Fojian*. It is a manuscript handwritten by Deru, attendant of Wuzhun Shifan. It was originally kept at Toufukuji Temple in Kyoto, and now in Kyoto National Museum. From the phil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dition and form of the manuscript, and giv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its author and background of formation.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is manuscript, the paper reveals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life of Wuzhun Shifan.

### **“Wang Kui Betrayed Guiying”: Its Different Versions and Political and Moral Implications in the Song Dynasty**

Yang Guo Fang Yuan

There are many versions of the story “Wang Kui Betrayed Guiying” in the Song dynasty. Wang Kui was a mental patient in a version of this story; but in another version, he became a love traitor and died from the revenge of

Guiying’s ghost. Literary sketches and dramas in the Song dynasty followed the latter version and criticized the love traitor harshly. This attitude reflected Song townspeople’s conception of karma and their sympathy for humble women. At a deeper level, the story was not just about love, but had a specific intention implying scholar-officials’ advocacy of morality and loyalty. This advocacy derived from their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Five Dynasties and worries about foreign invasion in the Song Dynasty. Scholar-officials used the image of Wang Kui to denounce betrayal in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the story of “ghost revenge” to publicize the conception of loyalty.

### **Beautiful Dreams about the East Capital:Kaifeng in the Memory of Southern Song People**

Liang Jianguo

The memories of Kaifeng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ere kept by Southern Song people through various ways. Their memories originated from old customs of Kaifeng and sites built in the Kaifeng style. Southern Song people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ture system of Kaifeng. Some people, e.g. Meng Yuanlao, directly wrote down their memories of Kaifeng; others told Kaifeng stories to people around them, some of whom fond of writing then recorded these stories. It was also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at some scholars began to take great pains to consciously collect literature of Kaifeng. Th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enabled later generations without ex-

perience in Northern Song Kaifeng to know this city and appreciate its past brilliance. Therefore, the image of the Kaifeng city as the capital of the Song Dynasty was shaped through several generations of literati's retrospection, dictation, recording and compilation after the imperial court moved to the south.

###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f the *Anna-listic Records of Major Events from 1127 to 1162***

Xin Gengru

Shanghai Library has a complete version of *Annalistic Records of Major Events from 1127 to 1162*. Comparing it with the version published by Chung Hwa Book CO., and the photocopy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the Wen Yuan 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Shanghai Library copy is more similar to the version in *Great Encyclopedia of Yongle* than the other two version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reaking the blind faith in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and restoring the original content of this book.

### **On the Authenticity of *Memoires at Quwei* and *South Window Records***

Li Yumin

*Memoires at Quwei* (*Quwei Jiuwen*) by Zhu Bian and *South Window Records* (*Nanchuang*

*Jitan*) by Xu Du are well-known *biji* works (literary sketches) in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two have twelve identical pieces of records. Yu Jiaxi determined that the latter plagiarized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was written by somebody else. With a close examination, however, this paper draws a completely contrary conclusion and argues that the existing ten-volume *Memoires at Wuwei* contains many forgeries.